

格扎维埃·格雷夫主编

经济学 与内源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F112.1

072154

经济学与内源发展

主 编：格扎维埃 格雷夫

撰稿人：阿卜杜勒·阿齐兹·贝拉勒，

穆罕默德·E.贝尼萨德，

约瑟夫·博尼亚尔，

阿兰·卡耶，

马丁·卡努瓦，

穆罕默德·伊斯拉米，

格扎维埃·格雷夫，

让·帕夫列夫斯基，

奥斯卡·皮诺·桑托斯，

伊尼亚西·萨克斯

译 者：胡中夫等

DI 83 / 3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北京

Original title:
Science économique et développement endogène

Chinese edition: © UNESCO 1988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经济学与内源发展

(格扎维埃·格雷夫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125印张 字数: 200(千)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001-0054-5/F.10(CTPC)

92-3-202208-7(Unesco)

定价: 1.90元

出版说明

本公司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翻译出版《经济学与内源发展》一书。本书从经济学的理论高度，评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最近三、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就今后的发展方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主编格扎维埃·格雷夫系卡萨布兰卡大学教授，公共部门管理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专家，其余撰稿人均均为世界各名牌大学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或研究专家。我们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本书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法文版，由胡中夫、艾顺章、金武、刘玉兰、胡敏、梁华、潘永明、周小月等同志全文（注释除外）翻译；胡中夫同志审校了部分译稿。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序言.....	1
引论 格扎维埃·格雷夫.....	2
第一部分	
对主导理论的质疑	43
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 伊尼亚 西·萨克斯.....	45
非洲的发展模式 穆罕默德·贝尼萨德.....	56
美国的经济学向拉丁美洲的输入及其对内源发展的影 响 马丁·卡努瓦.....	82
第二部分	
理论辩论.....	111
两个现代神话：经济的稀少性和合理性 阿兰·卡 耶.....	113
经济学与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伊斯拉米.....	151
第三部分	
解决的要素.....	181
经济知识的转让 约瑟夫·博尼亚尔.....	183
内源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起源、现状与前景 奥斯卡·皮诺·桑托斯.....	207
知识的内源和研究的结构 阿卜杜勒·阿齐兹·贝	

• v •

拉勃.....	226
不同制度国家间的知识转让问题：中国的情况 让·	
帕夫列夫斯基.....	241
作者简介.....	252

序 言

发展中经济在经济学中找到了解决其问题的某种依据吗？对于结构显然不同于其概念和模式形成时的一些社会，经济学家在提出经济政策建议时，同意使其概念和模式相对化吗？

国际上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业已开始，而这些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丝毫不能说这类问题的解决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一种不承认任何相对性的知识体系，同国际科学共同体犹豫地宣布其有效的关于使知识内源化的某些依然是有限的尝试之间，产生的争论已然停止。

本书不打算对一个目前尚处于有关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心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回答，而只是指出这个问题的起因、重要性和前景。据此，本书定将使南、北半球国家中所有那些谋求为世界经济学开辟道路的人——大学生、研究员、知识分子——感到兴趣，这种世界经济学并不放弃国家间的各种交流，而是要使这些交流成为无可争辩的进步的源泉。

本书将深入研究关于交流经济知识方面的意见——这种研究在《统治还是分享？知识内源发展和转让》一书(注)中已经开始，——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计划范围内跨学科研究的必然继续。这种研究由一些杰出的专家进行，他们意识到这种研究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本书中发表的各种主张和意见，以及对事实的选择和说明，完全由作者负责，并不一定反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1980年(法文版)，1981年(英文版)，1983年(西文版)。

引 论

格扎维埃·格雷夫

正当一个发展的新的十年在普遍令人失望的气氛中刚刚结束，南北对话在谋求恢复活力，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在不断多样化的时候，人们却看到，经济学围绕其最正统的组成部分正在规范化和变得僵硬起来。如果说不断听到有人在为内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和新的相互联系进行辩护，那么，不得不确认，根据一种能使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最佳地给以财源的唯一工具的经济科学，国际运动实际上正在谋求最大、最快的财政收益。

因此，经济知识的转让问题没有以应有的最好方式提出。甚至在考虑在技术上是否有可能向各种势力转让以前，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的论点，它把自己的有效的科学标准强加于其他一切创立经济知识的尝试。这种结构性的失调本身是令人遗憾的，但这还不足以予以谴责。当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的论点显得几乎不能引导发展的进程，反而不断导致发生错误时，它就会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反常现象在实际赌注受到牵连的地方普遍出现，这些反常现象长期存在，并已成为阻碍对经济理论进行最基本的概括的关键，从而使这种论点从根本上发生了问题，哪怕在重新发挥其主旨方面，在扩大其文本的执行方面，或者在揭露决策者的不理解方面，它都要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然而，问题是复杂的。如果在转让的进程方面可以提出某些书面建议，那么赌注仍然是基本范例的相对化。可是，这项任务

只能慢慢来，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它要发挥社会力量和智力。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为另一种发展或内源发展进行的辩护，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方式不会漠不关心。头脑中有这些界线，比盲目地为选择一种经济学，或为追溯纯属被埋在宝库里的古老的经济知识进行辩护要好。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比盲目地信赖某种以抽象作为其科学性标准，以内部严密性作为其确切性唯一保证的经济学要好；这一切，以自己的方式及在任何理智的论点所固有的范围内，对增加某种进程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不是没有贡献的，而随着人们参与这种进程，它的期限似乎更远了。

主导论点的危机

如果只谈世界规模转让的经济知识，可以有下列三点看法：

在发展经济学内部存在着某种主导论点，它围绕着同稀少作斗争的范例表达出来。各种异议由于属于另一种发展的盖然判断而从未胜过它；

这种主导论点已具有普遍性，其主要象征出现在国际组织的实践中，教育内容中，以及缺乏有效的反对力量方面；

可是，这种主导的、普遍的论点处在危机中。其原因不在于它自己的观点，而在于它不能提出确切和持久的经济政策建议，这就使它的科学地位成了问题。

一种主导论点

围绕某种合理性的范例建立的经济学，是一门同稀少作合理斗争的科学，是一种以最小的代价动员生产性资源的战略，一种为尽可能节省地满足人类需要进行的辩护。围绕人同自然的斗争的这种发展经济学，并不排除有时可以讨论诸如资源的再分配或

者建立超越传统参照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货币中介的相互联系网等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只有在对资源的最佳调拨带来积极的结果时才是可接受的，否则就会看到这门“科学”缓慢地和不可逆转地向“伦理学”变化。如果微观经济分析导致盖然判断和结论的收缩，而增加概念和推理的不定性，人们岂不会声称这种宏观经济分析是对上述这种变化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因此，现代经济学自己把自己的范围封住了，使自己成为以最佳地调拨资源来同稀少作斗争的科学。它使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只关心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是以不同的方式遵循可分性、确实性和排他性三个准则的。鲁宾逊·克鲁索的隐喻虽然普遍存在于新古典主义哲学中，但是难得不是这样迫切的。

经济缩减主义的后果和起因

这种经济缩减主义对发展问题带来极其重要的后果，我们把这些后果至少归纳为下列五点：

1. 私人所有制是作为对资源的最好占有方式出现的，因为它导致的责任分配可以尽快地动员各种力量，可以最适合于用经济核算的方法来鉴定赢利和成本（根德尔·弗朗克，1972年）。因此，可以不考虑，不管是自行经营的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在作出集体决定之前，为了达成谅解所花费的时间和讨论的费用。可以排除在分配利润和成本方面的不定性区域，这些区域实际上只是社会化和不负责任的候见厅。各种形式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等再也没有理由存在，除非在与存在外部影响和边际成本下跌同样的限制性的假设范围内。而且这些形式不应该自动地建立，而必须通过对各种可以设想的所有制形式的可供选择的赢利计算来建立。从这个基本观点得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经济分析从来不承认生产可以同时是消费，消费也可以同时是生产。发展的标准从而就变成一种生产竞赛，而

看不到生产和消费的失调与达到的生产水平无关，可以自动地保持下来，但是生产本身是否合理则要根据它带来的消费的可能性来判断。

2. 分等级的企业也是作为最适合于同稀少作斗争的动员和协调生产因素的方式出现的。责任的集中不但可以以最好的方式移动企业的干预地点，以对付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且由于责任集中而成为可能的严格分工将能以最低的费用保证管理。因此，劳动不再是一个能获得多种增值的过程的结果或赌注，而将是一个只能获得财政上增值的过程的工具。在这个发展模式的范围内，个人的发展只能是间接的和派生的。鉴于赢利是由保证来实现的，劳动者将只是在动用其力量的某个时间结束之后才得益，而作为消费者，在看到他们的生产者的地位得到改善之前，恐怕还不能首先得益。

3. 市场是作为生产单位之间对大家最有效的调节体系出现的。它尽可能迅速地传递信息，而不必进行任何计划制度的典型的物价上涨和下跌。当出现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时，市场进行适当的仲裁。因为市场的质量必然与其力量有关，世界市场就成了希望获得发展的市场的不能逾越的参考。

4. 通过市场和随着市场实施方面的有步骤的货币化，社会被线性化，这一特征使通讯系统变得尽可能的迅速，同时社会取消了一切质量上的优先权。一个问题的解决，一种需求的满足，不能再同时参考许多标准或许多方面：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和记录在唯一的货币空间中，哪怕要改变其性质。

5. 因此，国家或其他任何集中决策机构几乎没有意义了，除非为了在“私有制—分等级的企业—市场”这三部曲不再发挥作用的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最重要的是，应该仅限于依靠增长模式的标记来跟随这种“反对稀少的竞赛”，这些增长模式在其精心设计的表达方面借鉴于数学上的最佳控制论：进化论机制与整个

这种发展观念据以建立的自然主义决定论完全相同。

这样，经济分析使发展成为同自然界物资稀少作斗争的一种速度竞赛。

暂不批评这种分析，但应指出为什么这种分析不能考虑它打算使之发展的国家和社会的最特殊的问题。

不认为这些经济特有的不同结构能改变基本方案的意义。这些结构并非经常缺乏分析，但只是作为过去的见证人、发展的制动器、经济利益选择和最快流通的障碍综合在分析中。因此，甚至不认为这些结构能在分析的实施中导致级的差别：由于它们并不贴切地表达市场的透明度和生产因素的机动性，它们是应该尽快摆脱的障碍。

在经济制度中能存在的各种合理性，显然将不是作为基本假设的过于简单化的咨询机制，作为能够揭示发展的其他安排或其他战略而设想出来的。作为过去的见证人，这些合理性被认为是危险的；它们抨击经济范例的核心；当某个新的经济信息出现时，它们只能限制作出决定的速度；它们使同利润和成本个体化相连的责任分配制变得难以理解。

至于能干预发展进程的集体创造进程，诸如合作、互助主义和工人自治等，它们被这种规范化的办法弄得失去信用或甚至被排除。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能容忍这些破坏，哪怕对它来说要无视所有的集体创造现象，忽视个人力量以外的其他效力的源泉。

由于全面地排除各种变化和有步骤地简化各种特殊性，经济分析使经济活动现象变得真正“模糊不清”。同稀少进行的合理斗争是这方面的唯一动力，而人们不清楚这种斗争是否有朝一日将缓和下来或者甚至结束。

根据各种理论，缩减主义的相对性

所有的经济知识都不能归结为这种看问题的过于简单化。如

果某些理论不管其发明者自吹持有某些保留意见而完全说明了这个活动，诸如人们错认为不能再影响经济辩论的所谓具有历史意义的罗斯托理论（罗斯托，1964年），或者所谓的社会学理论（莱本斯泰因，1975年）——它与以前的理论的区别，在于或多或少提前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导致或多或少提前的行为的划分——那么，其他的分析则企图避开对发展问题的这种模糊的看法，特别是古典论断的某些更新，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某些论断，或者负有结构主义使命的其他论断。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左邻右舍的分析，对主导论断显然持相反的意见，它们不把经济问题视为人与自然的一种简单的对抗，而视为一种通过社会关系间接化了的对抗。不发达状态因而不再是天生落后的结果，而是社会冲突的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这些理论一直受到主导论点的影响，因为它们一直具有某种积累的決定论的标记，而且几乎不给社会的协调留出位置，而社会的协调并非只由经济范畴所决定。

同主导性逻辑分裂的第一个尝试来自 A. 刘易斯（1954年）对古典论断的更新，跟随他的有包括 J. C. H. 菲和 G. 拉尼（1969年）在内的一些作者。从生计领域存在着人口对可动用资源的压力这一观点出发，这些作者建议把这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逐渐转向一个现代化部门，在这个部门动用生产性剩余的可能性反过来会加速劳动力的转移运动。这个模式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发展观，并先验地阐明了不预断国家的社会经济选择，不忽视现代化部门与传统部门间的联系和在成为规范化前加以描述的好处（M. 贝尼萨德在本书中有述）。但是人们要问，这个模式的实际使用是否不会导致使两个部门彼此对立的某种最起码的二元论，是否不会导致给予现代性以某种优越标准的某种历史主义，是否不会导致某种自由放任主义，而这种自由放任主义一般是可以使人认清真相的，因为这个进程的开始只能来自动用外部剩余，然后才能动用内部剩余。因此，“刘易斯模式”的传统没有摆脱主导性逻辑的某些迂回

方法，最引起争议的是，传统社会由于没有被公开谴责为落后，它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同发展“背道而驰”。

凯因斯主义的分析比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更有条件考虑发展问题，因为它把结构性的严格的假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佩鲁，1974年，1981年)。它摆脱了与平衡、最优化等连在一起的概念，能重新阐明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既承认局部情况的特殊性和需要作出的回答的结构性的，又承认这两者之间的不可互换性。

所谓变相失业这一概念的变化，很能说明认识上的这种明显转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变相失业是同边际生产率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下低于边际报酬相联系的一个现象，而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变相失业可用剩余在经济中流通不畅，某些部门从而独占其他部门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来说明。

因此，用结构和权力术语作出的解释被推进得很远，增长极端论或者它的反面——失调结构论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宝库：发展不是有规律地扩展到某个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因素”，它是作为某些战略问题表现出来的，然后它可以从这些问题出发得到扩展。但是，尽管凯因斯主义的分析转移了某些边界和导致对发展的某种更能接受的分析，它却没有使某些人摆脱继续压在发展经济学头上的决定论：问题仍然是物资稀少，象较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某种增长模式(皮诺·桑托斯在本书中有述)，对人类进步的某种模糊看法，使用的力量或执行的政策的主要在数量上的某种增值。这样，促进工业化的工业模式对增长极端的分析作了规定，重新拣起这种分析，这种模式在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揭示了这一行动遇到的一些困难甚至陷入的绝境：这种模式在强调发展进程的文化赌注的同时，遇到了存在着先决的财政剩余、有利的推广场所、必要的进口熟练劳动力等问题。这种模式忽视特殊工艺的问题，导致目前日益严重的对外部的依赖，而且从长远来说，使独立成为问题。

二元论的分析——今天它确实已丧失在50年代和60年代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几乎没有避免正统分析的简单化(富尔塔多, 1974年; 根德尔·弗朗克, 1972年; 皮诺·桑托斯在本书中有述)。另外, 由于两种不同的经济——但其中一种立即被称为落后的, 另一种被称为先进的——的共处, 分析明确地承认其基本概念的相对性, 这就明显地降低了这个出发点的价值。因此, 确认可以有与传统的经济合理性不同的合理性, 有导致攒钱而不是导致积累的动员储蓄的过程, 有增加游手好闲的影响而不是动员生产力的报酬制度等等。但是, 基本概念还是一个样, “落后”部门只是从现代化部门转化起才被觉察出来。因此, 可以从二元论分析中得出的经济政策的建议, 同可以从主导经济学中推断出的经济政策的建议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建议强调国际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和社会观点上的破坏作用。人们还可以考虑, 这些建议是否真正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替代进口的政策不一定要同对外部的依赖决裂: 一切取决于有关国家动员财政剩余的能力和这些国家在原料方面的基本配备。人们还可以考虑, 因物资匮乏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的集中是否不会通过使用国际贸易格外投机的手段表现出来。以此为理由来揭露二元论将是不符合实际的, 但是应该看到, 依靠与主导分析同样的发展模式和同样的对技术进步的信任, 二元论导致的结果相差无几(贝尼萨德和卡努瓦在本书中有述)。

如果说凯因斯主义的和二元论的发展分析虽在开始时作了努力, 但没有同正统论点的前提决裂, 那么对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发展分析显然不能等量齐观(阿明, 1972年; 德塔纳·德贝尼斯, 1966年; 皮诺·桑托斯在本书中有述)。认识论的决裂难得在这些方面产生如此明显的影响; 如果说同稀少进行的斗争仍是经济学的基础, 那么这一斗争不能归结为一种对自然的斗争; 通过人的关系, 斗争的内容取决于组成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因此,

发展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关系状况，特别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国家间不平等的贸易问题。于是，同在支配国家内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出现相联系的活力，将冲撞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掠夺的场所，商品的销售地区，有利于发挥被非常低廉的劳动费用吸引而来的资本的作用的环境，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发达的产物。建议并不总是象判断一样地得到发挥，但是将依靠构成新古典主义范例的难以磨灭的超越的东西：对作为发展障碍或发展因素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作用，在一国和国际上集中进行分析。但是应该承认，这个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的分析的宝库——它只不过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常常被归结为一种单义的对历史的看法——没有常常得到维护。某些思想家有时向工艺决定论让步，他们认为可以把发展归结为一种单纯的提高生产力的竞赛，而不管生产关系的改变。于是，由此导致一种同主导分析非常接近的，同某些结构性建议相匹配的分析，这些建议属于“结构性的解冻”的程度比属于上述辩证法的程度要大得多。但是，这是一个偏向，不管它多么重要，都不能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总之，我们要看到，另一套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观点非常接近，但基础不同。根据诸如安德烈·根德尔·弗朗克(1972年)或萨米尔·阿明(1972年)的分析，确信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形成并维持了一些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和另一些国家的富庶。不管这是有意识的剥削策略的结果还是判断错误的结果，国际一体化导致了国家的爆炸，国际援助充其量只能归结为一个单纯的管理不平等的工具。但是应该注意到，对于列入这个问题范围的作者(除上述两名作者外，还有E.A.布雷特、F.E.卡多索、萨阿尔·加兰、安·塞德曼、塔马·斯藏特等)来说，各项建议将随着不同场合而明显地变化。一些作者认为需要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另一些作者则认为首先要对国际贸易或国际货币体

系的破坏性侵犯，对支配国和跨国公司的工艺的破坏性侵犯进行自卫。还有一些作者认为，要使国际援助变成一个支持发展的有计划的常设机构，可以说是要它成为全世界所得税的产物。因此，可以看到，解决办法远不如预断的那样一致。无疑是一个重大问题，它使得这种把不发达状态归结为历史产物，而不是发展落后的说法，不能导致以形成一个明确的范例来替代线性发展的范例。尽管作者的观点有差异，对某些机构强调得多，而对另一些机构则强调得少，但是没能阻止他们对不发达状态有共同解释，但是这些差异使某种能抵制主导分析的新的发展理论的出现更成了问题。

一种论点的统治及其成为认识论的理由

因此可以看到，如果说发展经济学同正统论点决裂的尝试层出不穷——鉴于它的对象特殊，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那么这些尝试没有拿出真正的论点来反对正统的论点，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甚至受其影响的政策，有当别论。或多或少地对发展提出同样的疑问，矛盾地鉴别发达社会和传统社会，这些情况无疑在这个结果中大量存在。因此，在这一阶段重提经济学建立的条件并非无益。

18世纪末，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这是从我们现代给今天这门学科的界定意义上来讲的——产生于新的物质现实和尽管业已存在但却将要受到重大革新的分析之间的某种结合。新的事实十分清楚：分工的强化，商品生产的增长，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不必在这方面强调。

更重要的是要指出认识论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将如何处理从相当不同的角度对财富作的分析，因为对经济问题已有若干看法。这些看法已超出政治和道德的范围，因为贸易被看作对大家都有利，从而不能使个人之间对立起来；又因为在市场上谋求个人利